

# 適應與堅持一對「天津工商學院—津沽大學」 天主教使命及其實踐的歷史考察

田燁帥

北辰文化研究所

## 【摘要】

天津工商學院是天主教法籍耶穌會傳教士在華創建的一所高等院校，1923年秋季招收預科班，1925年始提供大學教育，1933年在國民政府立案，1948年變更為津沽大學，1951年被新政府拆分而退出歷史舞台。學校創建的初衷是為在華天主教贏得一個美好的未來：走出與中國社會隔離的困境、尋求與青年人的相遇、加強在知識界的影響，最終通過文化事業參與中國社會現代化的進程。

此論文力圖在「文化傳教」這一寬泛的主題之下，研討工商學院-津沽大學的創建、其天主教特徵及獨特的精神、對宗教使命的實踐以及遇到的挑戰；考察「立案」風波背景以及紅色政治之下學院的創建者在宗教層面所展示的適應與堅持。

## 一、天津工商學院—津沽大學源於「文化傳教」思想

在天津創辦一所由耶穌會傳教士負責的學校？最初的構思由法國駐華當局提出。時間是1884年。歷史背景是大東京戰爭。法國外交人員強烈渴望在中國北方創建一所中法學校，助力法國貿易和推動在華文化影響。法國駐天津領事林椿與駐華全權公使巴特納取得共識：在天津為中國人建立一所科技學院，交由法籍耶穌會士領導。這所高校亦是法國對新教傳教士在華興辦文化事業的回應，他們中的大多數被美國和英國所支持，推動了英吉利—撒克遜的影響。從1856年開始在直隸東南代牧區服務的耶穌會士認為此項計劃有利於「文化傳教」，可以幫助教會進入知識文化界，遂表達了合作的意願。但由於北京遣使會持反對意見，計劃未能實現。

之後，法國當局嘗試與李鴻章合作辦學，但後者認為傳教士只可在合辦的學校中教書，不能擔任領導職務，巴特納認為這個條件是不可以接受的，天津中法學校的計劃最終放棄。但耶穌會並未中斷對於「文化傳教」的思考和追求。1886年5月，中國北方各宗座代牧及

代表在北京舉行第二次教務會議。<sup>1</sup>直隸東南代牧主教步天衢提議研討「教授歐洲科學知識在天主教發展中的位置」，即傳教士興辦學校的問題。他的主張未能獲得與會人員的一致認可，教長們認為傳教的第一要務是宣講耶穌基督，施行聖事，拯救人靈。步天衢主教於是藉著論及教外人皈依的主題表達他的想法。

「中國的知識界和上層社會人士皈依基督信仰是（我們）強烈渴望的，他們將成為很多人跟隨的榜樣。為達此目標，開辦學校是上上策，招收教外青年才俊培訓歐洲的語言、科學與藝術。即便在這些學校中，我們沒有能讓多人皈依，會從很大程度上減少、阻止人們對基督宗教的仇恨。」<sup>2</sup>

步天衢主教的發言引發了與北京遣使會的直接對立。北京代牧戴世濟（Mgr Tagliabue）指責耶穌會參加地區主教會議的動機就是讓北京代牧區為其打開天津的大門，並宣稱只有他能評判在北京代牧區內建立傳教士事業的合宜性。第五次會議的時候，步天衢主教收回了自己的發言。

1910年9月13日耶穌會香檳省對直隸東南教務進行視察，觀察員布列神父（Poullier）咨詢參議員的建議之後決定：以法國里爾的理工學院（l'Institut des Arts et Métiers）為藍本在河間創建一所技術高校。1913年6月，專職負責創建學校的狄志遠神父到達代牧區，但他在視察河間城之後提出了反對意義，認為在農村地區建立工業學校是不合宜的。儘管如此，直隸東南耶穌會還是在河間城置地，並開始了建築工事，後因第一次世界大戰的爆發，經濟援助被切斷而被迫中止。（戰後改建為中學）

1918年7月16日，教廷傳信部長王老松樞機（Guillaume Van Rossum）組織針對中國教務狀況的小範圍調查，問卷內容包括中國教務整體發展、傳教士們的具體活動、本地神職的培養及與外籍傳教士的關係、教會學校、教友生活、與教外人關係、新教友培育等。10月18日，直隸東南代牧劉欽明主教在回復聖部的報告中特別發出「各傳教區合作發展文化傳教事業」的建議。

「因為影響還象過去一樣局限於儒家文人（Lettré），唯一進入到知識份子和富裕階層的方法就是創建各水平的學校。基督新教藉著他們的青年人協會、教育事業（7

---

<sup>1</sup> 1874年教宗比約九世將中國傳教區分為五個大區。1879年，新教宗良十三又將遠東教務劃分為八個大區並組織地區級的主教會議。地區主教會議的舉行是視具體情形而定的，並沒有固定的週期。第一屆中國北方區（直隸，蒙古地區）主教會議於1880年舉行，討論議題是「本地聖職人員的培養」。

<sup>2</sup> BECKER Emile, *Un demi-siècle d'apostolat en Chine, le Révérend Père Joseph GONNET*, Ho-Kien-fou, Imprimerie de la Mission, 1916, p.199.

所大學，16所醫學高校）在各大城市的富裕階層中取得了令人矚目的影響。他們的發展和成功指示了真正進入的方法：對窮人開放的學校、貴族學校、醫學院、職業院校。戰爭的結束將成為天主教會擴展外部影響的唯一好機會。但是，從整體上來評斷，沒有一個傳教區有足夠的財力和人力，必須要幾個代牧區聯合一起，為共同益處而興辦共同事業。」<sup>3</sup>

1919年10月，宗座巡閱使光若翰主教（Mgr de Guébriant）到達直隸東南代牧區中心獻縣進行教務視察。他跟隨傳教部的建議，提出在天津創建一所高校的願望。<sup>4</sup> 劉欽明主教隨後呈上一份創建職業高校的建議書，並列出實現願意可能遇到的困難，主要是指耶穌會士和遣使會士的協調問題。<sup>5</sup>

駐天津的耶穌會神父桑志華也在呈遞給光若翰主教的書信中（1919年12月10日）表達了發展教會學校的渴望：在不同的傳教區為最好的學生建立最高等級的農校。<sup>6</sup> 另外一份沒有署名的報告書《幾點思考》亦提出：為了擴展影響，天主教會必須在創建不同類別的學校工作上更加努力：

「天主教會有數目，基督新教派有影響力。毋庸置疑數目是重要的，因為「派遣」人上天堂是第一位的。但是，我們不應該更努力也獲得影響嗎？為此，支持、鼓勵好的、天主教的出版事業：中歐語言的報刊；通過建立不同等級的學校提高我們天主教徒的文化水平；最好，如可能，（讓）人們擁有由幾個代牧區聯合創建的高等教育。」<sup>7</sup>

這一時期，在華天主教傳教士整體上認識到文化事業在宣教中的重要性以及緊迫性。天津工商大學的首任校長于傳澤這樣形容那個時期天主教傳教事業面臨的尷尬局面：面對異教、基督新教的影響，天主教被人認為是“在科學領域中沒有能力的競爭者”。<sup>8</sup> 中國信徒亦積極推動文化宣教，1912年9月20日，英斂之聯合馬相伯致書羅馬教宗比約十四，直陳在北京開辦一所天主教大學能給傳教事業帶來莫大的益處以及缺乏教會大學所帶來的弊端。1917年英斂之又發表《勸學罪言》，再次呼籲文化福傳。1922年來華的教宗代

---

<sup>3</sup> 摘自趙振聲主教為 *Apostolat Intellectuel en Chine* 一書所寫的序言，序言中引用了劉主教的報告，原文為法文。

<sup>4</sup> 傳信部檔案，N.S. Vol. 698. Ad omnes sacerdotes vicariatus Tchely Maritimi.

<sup>5</sup> *Histoire de 100 ans de la mission de Xianxian*, texte du Père René Petit, p.407. 存於法國耶穌會檔案館。

<sup>6</sup> 巴黎外方傳教會檔案館，光若翰卷宗，AZ-5.

<sup>7</sup> 同上，報告書由法文寫成（*Quelques réflexions*）

<sup>8</sup> JUBARU Paul, « Un Institut de Hautes Etudes à Tien-Tsin », *Chine, Ceylan, Madagascar*, mars 1923, p.7.

表剛恆毅主教也分享同一的理念，他在日後的回憶錄中這樣來談論中國教會的未來。

「中國的未來在很大程度上是在各種學校中準備的。天主教會的未來也將被準備，成功或者失敗，都取決於我們將來提供給中國神職和天主教青年們，特別是大學生們的培育。」<sup>9</sup>

1920年7月，教廷傳信部分別緻信獻縣劉欽明主教和天津代牧區（1912年從北京代牧區分立）文貴斌主教，要求雙方直接協商在天津創辦一所由耶穌會士負責的高等學院。文貴斌主教從中華教務發展全局的高度著想，欣然給予了准許，並確認耶穌會士享有聖教法典賦與修會人員的權力、享有聖座為建校特別賜予耶穌會的權力。

裴百納和裴化行兩位神父在致法國友人公開信中強調這所高校的重要性：

「這個高等教育事業是急需的，它的創建已經是很遲了。如果說為引導大眾來講已經太遲了，它還是應該佔據一個位置。至少它能夠顯示天主教會的存在，至少讓中國的上層及領導階層不至於懷疑或相信說天主教只是為農民和窮人。因此，必須要加快步伐，自我展現至少（教會）和他們具有同樣的高度，甚至是高於他們。

必須要加快步伐……處於目前中國政治混亂的境況之中，沒有人來限定教育，但是如果一個強勢的政府掌握政權，很有可能出現教育的官方壟斷，伴隨著對宗教（教育）的驅逐。（我們可以希望已經建立的學校可能持續辦下去）」<sup>10</sup>

## 二、學校如何體現其天主教特徵？

學校創建時立名「天津工商大學」。此外它還有一個宗教名稱：「聖心學院」。這不是一個虛名，因為它昭示著「工商」的宗教特性。大學的追求並不局限於科技、商業、文化教育的發展，它志力於在知識界為天主教會贏得尊榮，幫助福傳工作的進展。

### （一）耶穌會士負責行政管理

工商大學的行政設置並不複雜，但很有特色。院務長是學校的全權管理者，同時也是校內耶穌會團體的負責人，由獻縣耶穌會會長在徵得香檳會省的同意之後任命。教務長同

---

<sup>9</sup> Cardinal Costantini, *Réforme des missions au XXe siècle*, Paris, Casterman, 1960, p.170.

<sup>10</sup> 《Appel des Père Augustin et Henri Bernard en faveur de l'Ecole des Hautes Etudes de Tientsin》. 法國耶穌會檔案館，GMC 95/4/1.

樣由獻縣耶穌會任命，全力輔助院務長工作。校內耶穌會士代表組成一個小型參議會，以院務長為中心，共同探討學校發展要務。

## （二）分享耶穌會教育的共同理念

耶穌會教育機構的共同理念可被總結為「培育平衡的人」。它們致力於幫助每個學生發現、發展自身的才華與天賦，在團體生活中學習成為一個負責任的人；它們啟發學生的公共道德意識、培養正義感、讓他們成為對社會有用，為社會服務的人。因此，在耶穌會的學校中，對學生的個人陪伴以及師生之間的情誼在教育過程中佔著很重要的位置。耶穌會做為天主教中最大的修會之一，它所興辦的教育理所當然地為教會服務，因此每一所學校都是一所使徒性機構，雖然不尋求直接加給學生宗教教育，但它為學生打開通往天主教信仰的大門。耶穌會學校是通過為社會服務、為學生服務，達至最終為教會服務的目標。<sup>11</sup>

## （三）具有公教色彩的獨特性格

「工商」以「實事求是」作為自己的格言，奉行三項教育基礎原則：倫理教育、才智教育、體育教育。

「科學救國，效著乎西洋；裕民保種，端賴工商。煌煌我校，踞析津之陽；樂育善誘哉，成棟梁。莘莘學子負奇資，如圭如璋；切磋琢磨，集於一堂。濟濟青年勤學問，日就月將；藏自修游，教亦多方。

守校訓，誓永志而弗忘；實事求是，乃成德之梯航。知識日以進，體魄日以強。三育完美，二科專長。尊師敬友，所學勿荒。幼學壯行，庶輓瀾狂。謹祝我校，如陵如岡，萬歲無疆；人才輩出，久久自芬芳。」

—天津工商學院校歌（1937年版）

倫理教育是核心，目標是將學生培育成自由的人，同時又讓他們明白自由的限制。

才智教育是主體，既包括專業技能之培育還包括自我管理的能力訓練，總是引領學生尋求更高的思考能力、分析能力、更嚴謹的邏輯和批判能力。「工商」雖然是一所職業高校，

---

<sup>11</sup> 參照 1. Kolvenbach Peter-Hans, *Les caractéristiques de l'éducation jésuite*, World Union of Jesuit Alumni, 1993, 101p. (《耶穌會教育的特徵》);參照 2. DUMORTIER F.Xavier, GANTY Etienne, HERMANS Michel, *Tradition jésuite : enseignement, spiritualité, mission*, Bruxelles, Presses universitaires de Namur, 2002, 184 p. (《耶穌會傳統：教育、神修、使命》)

卻首先尋求人的全面發展和人文才智的提高，因此特別重視哲學的教學。耶穌會士們認為人生的價值與目的是現代最迫切，最重要的問題，而解決問題的工具就是哲學：

「學校的宗旨雖然說是造就實業界的人才，但最重要的還是造就誠實的人，哲學就是一種最大的幫助。學校不滿足於為工廠培訓技工，它所希望的是有創造能力的工業界人才，有作為的商界領袖，哲學能為學生開啓思考的大門。」<sup>12</sup>

體育教育則是不可或缺的條件和基礎，學生的健康決定著教育本身的成功與否，也決定著他們能否勝任將來的工作，對工科的學生來講尤其重要。因此，學校特別注重體育設施的建設、組織各種形式的體育競賽。

為了給學校的發展打下穩固的基礎，耶穌會士從建校之初就制定各項規則。無論是學生、教師還是工友都依規行事。大到校政，小到宿舍管理，具體到學習中的每個環節：教室、自習室、圖書館，都有章可循。各項規則具有明確統一目標：

「即培育大學生的氣魄又培育他們掌握真正的科學知識，發展他們的人格和特徵，引導他們尊重合法政權，教導他們自由的限制和好的使用方式，同時給他們提供普遍知識和專業知識，專業的技能使他們有一天能夠在公共和社會生活中獲得一個重要的位置。」<sup>13</sup>

耶穌會士和教師教書之外，還應該負有陪伴的角色：

「所有的老師都應該努力取得學生們的信任，向他們展示父性的關懷，關注他們的需要，也關注他們的健康，不吝嗇任何力量幫助學生進步，同時也要密切地、積極地監督他們，引領他們。實行權力並不難，但我們要求精神，規律的、紀律的、良好秩序的精神，良好秩序是所有真正的教育的基礎，是精神的，也是心靈的基石。」<sup>14</sup>

在校務管理的過程之中，還須要特別注意三項精神培訓，那就是服從、禮貌、用功。<sup>15</sup>

---

<sup>12</sup> 參照學校雜誌：*Bulletin des Hautes Etudes Industrielles et Commerciales*, n°1, mai 1927.

<sup>13</sup> 法國耶穌會檔案，GMC 91/1. *Hautes Etudes, Tianjin, Prospectus*. 1927.

<sup>14</sup> 同上。

<sup>15</sup> 參照學校雜誌：*Bulletin des Hautes Etudes Industrielles et Commerciales*, n°1, mai 1927, p.5.

#### （四）宗教教育及宗教活動

學校從創建之初就為學生提供瞭解天主教信仰的相關課程，但課程設置為選修，不強制學生參加。

「哲學課」是傳播信仰的一個間接途徑，身兼教師的神父們通過教授哲學讓學生瞭解天主教的思想，特別是在「哲學倫理」課中，「天主教倫理」可以直接成為教學內容的一部分。

學校還開設有慕道班，為願意進教的學生提供系統的培育。

學校在其主樓西端建有一座聖堂。天津代牧主教文貴斌決定讓這座聖堂成為一所公開教堂（與堂區聖堂無異），意即它不僅可為學校的學生、職工提供宗教服務，而且還可以接待周圍小區的居民。有一位耶穌會神父專職負責，提供禮儀服務、組織教理講授和其它宗教活動。

學校中亦有專職神父輔導信教學生，在每學年的開學及放假時組織避靜，學期之中每周組織兩次教理講授，不定期組織宗教性演講或其它活動。工商附中成立之後（1931年），由於學生數目大增，而且年齡差異巨大，耶穌會安排三位神父分別負責大學生、高中生和初中生。

公教學生有屬於自己的小團體。「聖母會」成立於1927年11月。1932年附屬中學部信教學生組建了「天使會」。1934年9月高中部和大學部公教學生聯合組建「工商公教青年會」。均有神父擔任輔導員。

#### （五）社會公益

天津工商的宗教活動外延至社會公益。學校公教青年組織的會員們定期到天津市各監獄控訪，他們的仁愛工作也結出了豐碩的靈性果實，多人領洗入教。

1925年直奉戰爭期間，校務長裴百納組織學生到各居民區為難民募捐。

1934年4月，在訓育主任劉迺仁神父的推動下，天津工商學院組織「通俗科學演講團」，大學生志願者每周通過仁昌電台組織講座，傳授自然與社會科學知識。

1939年夏天天津發生水災，天津工商學院開放校園，搭建帳篷，盡最大力量接收難民，公教學生們亦投入到慈善救助活動中。

1947年同樣是在劉迺仁神父（院務長/院長）的推動下，天津工商開辦義務學堂，大學生（主要為公教青年會成員）為沒有機會接受正式教育的窮人講授基礎知識。

1948年，劉迺仁院長神父又推動成立了一所義務幼兒園，文學院家政系四年級的大學生們負責教學工作。

### 三、「立案」風波衝擊下的適應

「立案」風波始於1920年代末期，私立學校，包括教會所辦教育機構都必須向政府申請立案。這從很大程度上來講是「非基督教運動」和「收回教育主權運動」的延續，又符合南京國民政府統一中國後對教育事業進行規範的發展要求。「立案」之所以成為風波，是一些「立案」條款（1929年8月29日《私立教育規程》），特別是要求學校校長必須具有中國國籍、政府定期對學校進行檢查、對學校提出最底年度消費、奉行教育與宗教分離繼而禁止傳教等，在傳教士中間引發了大討論。教會團體最為擔心成立校董會之後行政權旁落和宗教教育自由缺失，因為這將直接衝擊傳教士辦學的宗旨。

#### （一）立案後的「工商」仍是天主教大學嗎？

相比於北京天主教輔仁大學而言，獻縣耶穌會對於「立案」的態度首先是謹慎觀察。直至1931年2月，獻縣耶穌會參議會才發起是否立案的討論，但很快做出申請立案的決定並開始準備應對措施。

-政府部門監管學校的財政，要求除學費之外的其它收入足以維持學校的年度開銷，而且一所大學的年度開支不得低於30萬；

-耶穌會士決定將原本合在一起的學校帳目與校內耶穌會團體帳目分開，學校的開銷歷來是規範的，沒有問題。有關預算的最低額度，只須要給神父們開工資即可（他們從來不領工資），他們再以匿名的方式捐贈給學校。

-中國人應該在校董事會中佔三分之二份額；

-耶穌會可聘請中國籍神職來擔任校董，法籍耶穌會士保留最低的名額。

-一位中國籍的校長；-

-耶穌會決定為其選擇一位校長助理，並享有實權（院務長），並盡可能選擇一位中國神職擔任校長。



-禁止宗教教育；

-可以在哲學課程中介紹教會的思想，這也是校方耶穌會的一直做法。

-禁止強迫未成年學生參加校內宗教儀式；

-附屬中學的神父還可以通告信教學生的父母，讓他們給予校方權力，督導他們的孩子參加教理講授和宗教禮儀。

-必須的黨義課程及「三民主義」教育；

-教宗駐華代表剛恆毅示意可以開授「三民主義」課；可以在授課過程中加入天主教會的理解。

1931年9月，耶穌會組建了臨時董事會，並任命中國籍耶穌會士趙振聲為法定校長，主持「立案」申請。1933年8月，天津工商大學獲得政府立案，但因為校建未達至三院九系標準，不得繼續冠以「大學」名銜，而更名為天津工商學院。

1934年組建的正式校董事會名錄顯示：董事會成員共計7名，中國籍5人，法國籍2人，其中6人為耶穌會會士。

「立案」後的校政採用「雙軌制」，校組織大綱第8條規定：本學院設院長院務長各一名，總轄全校校務。由校長執行法定簽署，院務長作重要決定，從理論層面而論，這種「雙軌制」可能會帶來一定的行政混亂，但事實上從未引多太多的負面影響，因為院長人選是耶穌會精心選擇的，新履新的華南圭院長曾是教務長的助理，與耶穌會有著愉快的合作關係，其主要工作是簽署法定文書及任命教師。1937年中國戰爭全面爆發後，華南圭辭職，校長由校董會主席，國籍耶穌會士劉斌代理，直到1943年7月，國籍耶穌會士劉迺仁接任院長一職。因為劉迺仁同時是耶穌會任命的院務長，兩種職務於一身，校政運行順利。

身為耶穌會士的教師還設法佔有「院務委員會」多數席位。此委員會由學校秘書長、教務長、訓育主任、各科系主任組成。教務長負責處理全校教學及學術設備；秘書長則幫助院長處理院務。

因此，從行政角度來講立案之後的「工商」仍然是完整意義上的傳教士機構，由法籍耶穌會士遵照天主教的精神而管理。雖然1943年學院因遭遇嚴重經濟危機而不得不對董事會進行改組，吸納社會名流及企業經理成為董事，劉迺仁與董事會各成員保持了良好的關係。工商學院仍然是完整的教會大學，但卻步入中國化的發展路徑。

## （二）立案後「工商」的宗教生活

立案之後，工商學院的宗教活動照舊，慕道班亦繼續運轉，並未遇到實質的困難。1934年6月2日教宗駐華代表蔡寧總主教視察工商學院，主持了大禮彌撒和師生座談會。1934年12月6日耶穌會香檳省會長杜甘棠神父（Thoyer）訪問天津工商學院，為13位學生舉行了洗禮。1935年1月7日蔡寧總主教在工商學院聖堂舉行禮儀為25位學生施洗，其中高中生15位、初中生7位、大學生3位。

信教學生很有活力，他們中半數以上每日早晨參與彌撒，常年如此。在各種學生組織中都有信徒的身影，他們在組織中沒有特殊的地位，只是用實際的工作和奉獻的精神來烘托學院的公教氣氛。信教青年常被告知，傳道工作不在於吹喇叭，而在於進入社會每個細胞，他們參與社會服務，製造公教氣氛，多取得了驚人的成績，例如1937年開辦的民眾夜校（持續一年半時間）、成立於1934年的通俗科學演講團。<sup>16</sup>

但為回應立案後新環境的需要，1933年9月杜甘棠神父要求同仁們一定要牢記從使徒性的角度來思考他們的事業：

「每個人都要從使徒性的角度，意識到這些事業（中學、大學）的重要性，通過在教外學生中傳播基督徒的精神，通過實現的皈依，成為攻克者，成為帶給別人基督徒教育的培訓者，也成為在外界產生影響的泉源，繼續為此奉獻所有心力，確認沒有什麼比「天主更大的光榮」有用的事情，全身投入到學校的整體發展之中。」<sup>17</sup>

負責信教學生的神父組建了一個「宗教培育及出版中心」，編輯信仰宣傳及哲學性護教書籍。狄守仁（Edouard Petit）神父於1936年出版《93題》，這是一本護教性的教理書，採用問答的方式。次年，申自天神父（Archen）用法文寫成的書（*Catéchisme Apologétique*），由中國教師和學生譯成中文：《人生基本問題的解答》。1938年這兩本書獲得教宗駐華代表獎。

工商學院還出版多部教會書籍，如《四福音》、《公商信友》雜誌（1937年）、《公教學生》雜誌（1940年）、《自尊》（1940年出版）、《我們的領袖》（1940年出版）、《耶穌的言行》（1940年出版）、《基督真徒的生活》（1941年出版）、《天主教教義提綱》（1941年出版），

---

<sup>16</sup> 參照〈工商的宗教生活〉，刊登於1940年《工商嚮導》，第61-62頁。

<sup>17</sup> 法國耶穌會檔案 GMC 90/3. Mémorial laissé au R.P. Charvet, Recteur des Hautes Etudes, par le P. Thoyer, Provincial de Champagne.

等。

這些書的出版正配合了抗日戰爭全面爆發之後工商學院牧靈工作的需要。在戰亂的特殊環境中，人更為需要精神的力量和慰藉，工商學院尋求瞭解天主教信仰的學生也開始增多，但人對於信仰與科學的關係還存有疑慮，他們很好奇地發問：這上機械師、建築學教師、化學教師怎麼能是天主教神父呢？貝興仁神父（René Petit）認為：工商學院的傳教使命就是要進入到這種張力的心臟，特別是在青年人承受苦痛、需要精神訴求的特殊時期，為他們提供精神服務；另一方面就是要打破知識青年所接受的這種理性與宗教對立的認識。

18

#### 四、紅色政治下的堅持

1948年11月天津工商學院成功地升格為津沽大學，校方舉行了盛大的慶祝儀式，但這卻成為它最後的輝煌。1949年1月解放軍接管了天津，同年10月1日中華人民共和國中央政府宣告成立，教會學校面臨一個全新的政治和社會環境。津沽大學的國際背景和教會特點使它陷入意識形態爭論的漩渦，面臨作為「帝國主義文化侵略工具」的指證。

早在1948年7月起，中國共產黨就在「新區」發起對舊教育的改造：派駐黨組織、成立教師和學生聯合組成的民主委員會、開設唯物主義及黨史教育。面臨新的變化，津沽大學耶穌會神父們持什麼樣的態度呢？第一，盡最大的可能保住學校重要的領導職務，奉行教會原則的同時尋求與共產黨政權保持合作；第二，如果合作不成，則耶穌會士們退出學校的領導層，中斷對學校的經濟投入，並嘗試著留兩三位神父繼續任教，因為他們可以幫助那些信教的學生。<sup>19</sup>

##### （一）津沽大學的新處境

##### 1. 學校行政混亂

天津解放伊始，各大學就成為了學生們的「集會」和「自由」之地，津沽亦不例外，每天都舉行集會，週末也不休息。劉迺仁校長接到政府命令：重新招收在1948年因在大學內組織政治運動而被勸退的學生。<sup>20</sup> 很顯然他們是共產黨員或外圍組織（民主聯合會）的

---

<sup>18</sup> 參照貝興仁神父家人所藏資料，Lettre du Père Petit : « les missionnaires », mai 1976, Taipei.

<sup>19</sup> 法國耶穌會檔案，GMC 105/1. « Quelques notes pour servir à l'histoire de la fermeture de l'Université », le 3 janvier, 1950.

<sup>20</sup> 法國耶穌會檔案，GMC 131/1. Rapport du Père René Petit : Aux Supérieurs Majeurs de la Compagnie de Jésus.

成員。「進步學生」到處張貼傳單，破壞校規，控制學校大門的進出，散髮污辱神父的畫報，沒有人能夠約束他們。<sup>21</sup> 隨後，一些年輕教師宣稱要廢除訓育制度，還要求耶穌會士公示學校財產，交由民主選舉的校委會來管理。這些行動得到了背後的支持，但當他們要求天津政府接收學校時，政府宣佈沒有足夠的財力，並宣稱學生們所為屬私人性質而與政府無關。<sup>22</sup>

春節假期之後，「進步學生」組成「自治會」並前來與校方談判學費數額，因為根本不可能達成協議，自治會發起拒交學費運動，引發危機。校方宣佈學校運行資金出現困難，一方面向法國緊急求援，<sup>23</sup>一方面督促學生交納學費。1949年4月「進步學生」製造了「麵粉事件」，他們未經批准而搶了存放在耶穌會院內，本為280位教職工準備的160袋麵粉，（共存400袋，屬於教師待遇的一部分）宣稱耶穌會神父是撒謊者和囤積者，成心讓學生受餓。組織發起反對大學校長劉迺仁和校務長兼副校長卜相賢（Bonningue）的運動。由於教師們只能暫時領到一半的工資，協助動員學生交納學費，完成80%，風波得到化解。但從此之後所有學生的活動都由「進步學生」控制起來了。<sup>24</sup>

## 2. 校政民主化

事件期間，劉迺仁校長離校它往，卜相賢以副校長暫時代行校長職務。1949年5月，津沽大學成立了「民主校務委員會」，以配合新形勢的要求。委員會由耶穌會士、教師、學生、工人代表組成，計25個席位，學生代表5席、耶穌會4席。委員會下設十餘職能部門，統領校務，取代原來的管理方式。從理論上來講，耶穌會已非大學的主人，但耶穌會神父們成功地保留了原有的部分領導位置。法籍卜相賢任副校長兼教務長，法籍暴安良任工學院院長、法籍房如晦任商學院院長，原大學秘書長沈晞改任大學副校長。1949年6月8日，國籍耶穌會士王俊德被董事會任命為校長。

「民主校務委員會」未能終結大學的混亂，因為委員會本身成了爭論的場所。房如晦總結這是「無資格、無效率」的統治：會議討論一天的結果第二天被完全推翻，重新討論，這不僅浪費大量資源而且不能進入主題。<sup>25</sup>卜相賢也在1949年10月15日的信中指出：「現

---

<sup>21</sup> 法國耶穌會檔案，GMC 105/1. 1949年3月16日房如晦神父致母親信。（托人將信件帶到上海再轉寄到法國）

<sup>22</sup> 法國耶穌會檔案，GMC 105/1. 1949年3月26日房如晦神父致母親信。

<sup>23</sup> 法國外交部檔案，La Courneuve, MNESYS 119QO, n° 324. Copie de la lettre du Père Bonningue, le 24 mars 1949.

<sup>24</sup> 法國耶穌會檔案，GMC 95/5. Du Père Watine sur les Hautes Etudes de Tianjin, le 26 mars 1949.

<sup>25</sup> 法國耶穌會檔案，GMC 105/1. Lettre du Père Louis Watine à sa sœur religieuse, Tientsin, le 13 août 1949.

在是無用之語和紙張統治的時代了！」<sup>26</sup>

### 3. 宗教教育仍可持續

1948-1949 年第二學期開始之時，政府教育職員來到津沽大學，向耶穌會神父傳達如下指示：「津沽是一所私立、天主教大學；你們仍然被允許開設宗教的課程，但不能夠設為必修；你們的學生可以去參加，也可以不去。另外，參加的學生一個學期只能獲得一個學分，如果他們能通過考試的話。」<sup>27</sup>

政府這項指令的背景如下：一些傳教士開辦的高校將宗教課程或者聖經課程設為必修，並且須要累積 20 個學分才能夠獲得文憑。但是在天津耶穌會的學校中，宗教課從來都是選修，而且不計入學分。所以這項新的政府指令帶給津沽學生的是一種「優勢」，很多信教學生報名參加宗教倫理課程，也有一些非信教學生為了補全學分而來聽課。卜相賢還組織增設了「公教概論」課程。

### 4. 政治教學

1949 年 9 月 26 日，華北高等教育委員會正式命令津沽大學開設「辯證唯物論」、「歷史唯物論」和「新民主主義論」。每門課程對應三個學分，各年級學生一律修讀，每周教學至少 3 個課時、須再加入 6 個小時的討論。一些個別的學系，比如說商學、財會，文學、還須要每周加入 3 個小時的政治經濟學課程，課程設置為 1 年，計 6 個學分，畢業之前必須修完。<sup>28</sup>

11 月 12 日，王俊德、卜相賢、沈晞被教育部召到北京，討論津沽大學的教學設置。按照規定，政治教育課程由大學教務長監督，他還要主持討論課程。但耶穌會神父不能直接組織講授與天主教信仰相反的課程，卜相賢於是通過沈晞向教育部官員表達了他的拒絕。津沽大學的政治課程獲准由另外一位教師來組織，但學生的興趣也不是很高，他們中的大多數認為討論課程就是在那裡耗費時間。卜相賢在 1950 年 2 月 7 日致省會長的信中寫道：利用學生對政治思想課的不耐煩，將討論主題引到哲學或者與大學生活有關的話題上來。<sup>29</sup>這成為日後卜相賢被批判的罪狀之一：抵抗政治思想工作。

---

<sup>26</sup> 法國耶穌會檔案，GMC 95/5. Lettre du Père Bonningue du 15 octobre 1949.

<sup>27</sup> *Histoire de 100 ans de la mission de Xianxian*, texte du Père René Petit, p. 724.

<sup>28</sup> 河北大學檔案，D373，第 1534 號。

<sup>29</sup> 法國耶穌會檔案，GMC 100/4. Lettre du Père Bonningue au Père provincial, le 7 fév. 1950.

1950年4月22日，津沽大學再次參加教育部組織的高校聯席會議，討論文學院課程改革，要求：全面取消「舊文學」，添加新文學課並以馬列主義及新民主主義觀點作為講授標準。<sup>30</sup>

## （二）對大學領導權的堅持

1949年11月，「民主校務委員會」進行重組，學生代表仍佔5席，但當選者都是信教學生。如果說耶穌會對結果很滿意，那麼進步學生的不滿就可想而知了，他們開始發難。同時期，中共天津市委決定津沽大學共產黨學生公開行動。<sup>31</sup> 他們牽頭組建了一個「校政革新委員會」，天津共產黨青年團、教育局的成員也來參加。房如晦神父致母親的信（1949年12月12日）描述了如下情景：他們藉口學校中存在獨裁者，將鬥爭目標指向三位負有行政權的神父（校長、教務長、總務）；他們在學生中煽動對耶穌會的致疑：天主教的神父在我們的大學中做什麼？他們指控宗教課是帝國主義；宗教課的成功是令他們狂怒的原因。

「校政革新委員會」最後提出三項具體要求：一是按照人民政府的指示來管理大學；學校的一切行政工作都應該為政治教學服務；撤除卜相賢的教務長職務，因為他沒有完成組織政治教學的工作。耶穌會士申明他們是從事教育工作的人，並強調作為天主教的傳教士，他們代表教會，不能做傳播唯物主義的工作；他們願意接受學校的民主化管理，但不接受無政府主義。12月25日晚，學生代表將上述三項要求列印出來，讓學生和老師們簽字，欲用「民意」表達的方式達到目標。結果顯示大多數的學生和職工不願意參與簽名運動；教師們雖遇到的威脅：如果不簽字，你就是反革命分子，就是人民政府的敵人，就會失去在學校中的職位，簽字者不足半數。接下來兩天，校園內貼滿學生的宣傳標語。12月29日，「進步學生」向大學校長王俊德發出最後通牒：如果當天晚上8點之前，教務長不提交辭職的話，學生們將前往北京進行控訴。

卜相賢對時局有著清醒的認識：

「我搓著雙手：一個大的審判呈現在我面前，但，這是一次，嚴格的宗教性審判。我強烈地相信這審判將成為對帝國主義者的審判。4點鐘的時候，一封威脅的信告訴我8點的時候暴力行動會開始。兩個傳信的人問我：你心裡面是怎麼想的？我回答道：什麼想法也沒有。他們憤怒地離開。校長神父是贊成我辭職的，我向他寫了

<sup>30</sup> 河北大學檔案，津沽大學卷宗：（D373）教務，課程 1949年6月15日。

<sup>31</sup> 《河北大學史》，第21頁。

辭職信……這是教務長向校長的最後服從。在遞交辭職信之前，(我)進行了廣泛地諮詢，問了所有的(耶穌會)教師和兩位(獻縣)傳教區的參議。大家共同決定我辭職……」<sup>32</sup>

12月29日晚上7點55分卜相賢向校長提交了辭職報告。第二天，其他耶穌會教師相繼辭職。因為董事會確認出席人數不足三分之二，王俊德於31日到天津教育局提交辭職信。這是耶穌會早前達成的一致：無論哪一位神父被強行地趕出學校的行政領導層，其他神父都會辭職，而且中斷每年約3,000美元(約佔校財政收入的60%)的財政投入。<sup>33</sup>

辭職風波引發了大學財政和人員的危機，也引發了天津政府的介入。先是1950年1月1日，6位耶穌會士被傳喚到天津教育局。主管對他們進行了三個多小時的反宗教及反對外國人的教育；然後反復地講學生們對耶穌會的報怨很多。耶穌會神父欲進行解釋，但主管不停地重復一樣的話。卜相賢於是直接問如何才能關閉大學？得到如下回答：你們隨意，你們是私立大學，政府不管，但仔細想好，檢查一個你們的動機，如果你們真要關閉大學，向北京申請，教育部會判斷你們的理由。第一次協商無果而終。1月8日晚，天津市市長黃敬將耶穌會神父和教育局主管召到市政大廳。他表明希望問題得到解決，而非大學被關閉，並表示：大學並沒有違反政府的法令，如果一些人藉口要求神父和天主教教徒必須親自來講授唯物主義，他是不贊成的。最終，市長要求耶穌會神父協商之後作出回答。<sup>34</sup>

耶穌會神父們分析黃敬市長的動機主要有四：一、如果學校關閉了，將對天津市造成不好的影響；二、中國新政府正要尋求其它國家的承認，學校關閉會帶來壓力；三、天津市沒有足夠的財產接辦大學；四、還需要耶穌會的科技教師。<sup>35</sup>經過考慮之後，他們於1月3日提交一份要求清單，並呈明如果市長願意解決困難，他們會將大學辦下去。

1. 無論是神職或是信徒身分的教授，都不能被迫組織或講授有違天主教信仰的學說。
2. 不得在校內公開污辱和毀謗宗教信仰。
3. 學生必須支付合理的費用。
4. 不得侵犯教職員和學生的宗教自由，不允許做出壓迫任何人的行為。
5. 副校長為耶穌會的代表，有權成為校務委員會的成員。

---

<sup>32</sup> 法國耶穌會檔案，GMC 100/4. Lettre du Père Bonningue au Père provincial, le 7 fév. 1950.

<sup>33</sup> 法國耶穌會檔案，GMC 105/1. « Quelques notes pour servir à l'histoire de la fermeture de l'Université », le 3 janvier, 1950.

<sup>34</sup> 同上。

<sup>35</sup> 法國耶穌會檔案，GMC 100/4. Récit condensé de la grande crise de l'Université, le 22 janvier 1950.

6. 每一項有關學校管理方面的改革，都要經過合法的途徑。
7. 我們無法解決的爭執，得尋求政府協助解決。
8. 天主教的四大節日應予放假。<sup>36</sup>

北京教育部也清楚天津耶穌會士提出的條件，將之解讀為一種威協；一位官員告訴輔仁大學芮歌尼神父，政府對天主教的耶穌會神父很不滿意。<sup>37</sup> 因此應該是與教育部溝通之後，黃敬於 1950 年 1 月 20 日書面回覆了津沽大學耶穌會：<sup>38</sup>

1. 政府所要求的政治課程是必須要開設的；如果還沒有的話，必須增加；但是神父和信教教師不須要親自組織；他們享有保持自己看法的自由。
2. 政府承認信仰宗教和不信仰宗教的自由；它也保障批判宗教的自由；但每一派要相互尊重，不得污辱對方。
3. 私立學校的學生應該交納合理的學費；學校應該避免無用的、浪費的開支；財政缺口可由外來捐獻補足。
4. 教職和學生應該尊重別人的自由；沒有任何一方可以強迫另一方。
5. 大學的副校長（是耶穌會的代表）必須要是校政委員會的成員嗎？我認為，他可以是，但必須由委員會自行決定。校政委員會必須是民主的，也就是由不同的部分組成，相互信任，共同行動。不同小組的代表應該表達他所代表組別的想法。<sup>39</sup> 為讓學校更完美，行政層和學生應該攜手合作。
6. 大學的內部問題應該在內部解決；必要的時候，政府可以幫忙解決問題。
7. 學校有權力在聖誕節（12 月 25 日）、諸聖節（11 月 1 日）、聖母無原罪節（12 月 8 日）和三王來朝節（1 月 6 日）放假，但是如果一些教師和學生希望在那些天工作和學習，學校不得阻攔。

等待市長回覆期間，卜相賢神父成功地申請到一張赴上海通行證。他在那裡與教廷駐華公使黎培里主教會見。駐華公使鼓勵耶穌會的神父盡最大努力將學校開辦下去，哪怕只能維持一段時間。<sup>40</sup> 耶穌會士們收回了辭職。但為緩解緊張時局，亦為了讓第二學期教學

---

<sup>36</sup> 參照復印件，法國耶穌會檔案，GMC 105/1.

<sup>37</sup> 參照柯博識著，袁小涓譯，《私立北京輔仁大學 1925-1950：理念、歷程、教員》，輔大出版社，台北，第 183 頁。

<sup>38</sup> 參照復印件，法國耶穌會檔案，GMC 105/1.

<sup>39</sup> 房如晦在黃敬市長的回復上面加註：學生代表佔校務委員會的 5%-10%，但他們不是被學生們自由選出來的。

<sup>40</sup> 法國耶穌會檔案，GMC 100/4. Récit condensé de la grande crise de l'Université, le 22 janvier 1950.



工作穩定進行，卜相賢讓出教務長一職，交由畢業於北京輔仁大學的天津教區神父孫志洪。

1950年3月14日，天津市長黃敬到津沽大學視察，向全體職員發表講話，將不睦視為國民黨統治遺留的結果，稱贊了大學對中國的貢獻，之後宣佈了三項主張：

「宗教課必須是選修的。大學不能夠強迫我們的同志參加宗教的課程，也不能阻止他們尋求真理。沒有宗教信仰的人應該尊重有信仰的人。他們應該彼此尊重對方的宗教和信仰。污辱和壓迫都是被禁止的。

大學的領導層必須要講真理，學生一方應該用心上課，奮力突破一切困難。

學費應該設置在合理的範圍。只有十分之一的貧困學生可以被免除學費。另一方面，這個學期中，教育部會撥發一些財政補助金。」<sup>41</sup>

宗教教育與大學行政權是耶穌會的底線，黃敬市長的講話給了他們繼續開辦大學的希望；但同時北京輔仁大學的經歷又告訴他們：市長的許諾也僅僅是權宜之計。學生們接受耶穌會神父重返學校，不代表著大學被關閉是遙遠的事情。

### （三）大學被沒收及其中的宗教因素

基督宗教被定性為帝國主義的服務者，新中國要求它自行改造，作為存在下去的條件。1950年初，基督新教派內首先發起自養、自治、自傳的運動：經濟獨立、行政管理獨立、牧靈傳教獨立。1同年11月，伴隨著「廣元宣言」的發表，「三自」運動正式在天主教界推廣。各媒體充斥著對自治、獨立的要求，以及對羅馬教廷帝國主義的批判。

津沽大學的耶穌會神父被要求提交書面答卷，說明對於「三自」的看法，對「反對帝國主義」的認識；被要求與當局積極合作。<sup>42</sup> 12月中旬，「進步學生」再掀反對耶穌會士的浪潮，污辱性的漫畫貼滿大學牆壁。12月20日晚上10點，警察對校內耶穌會院進行了封鎖，他們在學生的領路下對院捨進行檢查。兩位年老已經入睡的神父也必須起床配合。警察將所有外籍耶穌會士的文件帶走，但沒有沒收國籍神父的資料。從那一天之後，警察

---

<sup>41</sup>譯自法國駐津領事館管理人呈遞給駐上海總領事的報告。AMAE. La Courneuve, MNESYS, N° 324, écoles françaises 1947-1953.R. Meffreys, gérant le consulat de France à M. J. Royere, consul général de France à Shanghai, le 15 mars 1950.

<sup>42</sup> 法國耶穌會檔案，GMC 127/2/2. Note du Père Petit.

深夜來訪成為常事，他們須要知道神父們都在做什麼。<sup>43</sup>

1950年12月26日，天津市各大中學校的學生組織了反對天主教外籍傳教士的遊行大會。津沽大學張俊生、艾長庚、徐文泉、鄭人龍、劉景和等人寫信給天津日報，要求政府懲辦卜相賢等帝國主義間諜。之後又有50位學生聯名寫信給天津市警察局要求將他們逮捕。<sup>44</sup> 1951年1月1日，天津市教育局命令卜相賢辭去津沽大學副校長的職務、命令孫志洪辭去教務長的職務。卜相賢被列14宗罪，主要是：侵犯中國的教育主權、阻礙政治思想教育、為美帝國主義服務，破壞愛國運動、中傷政府的宗教政策。<sup>45</sup> 1月8日，津沽大學董事會主席，共產黨員李燭塵（1949年11月29日接任）到校宣佈：由於學生反對，卜相賢、孫志洪和沈晞不能再擔任原來的職務；政府派王金鼎來校工作，任教務長職；董事會同時推薦李寶震任副校長。房如晦在信中寫道：有人說，一切都已經準備好了，如果有人拒絕或者抗議，將被直接逮捕。<sup>46</sup>

王金鼎是天津文化教育部的幹部，從1941年始在天津建立地下黨和外圍組織，抗日戰爭勝利後，以教師的名義到工商學院工作，天津解放後退出，但繼續組織津沽大學內共產黨學生的活動。<sup>47</sup> 王金鼎到校主持工作意味著津沽大學被全面接收。媒體更將之解讀為從「為帝國主義服務的大學」變成為「為人民服務的大學」。房如晦在致友人的信中講：原來校內升掛教宗旗幟的地方現在被插上紅色的黨旗。<sup>48</sup> 津沽大學被迫放棄它所有的天主教色彩。

「三自運動」以來，很多拒絕在宣言上簽名的神職被逮捕，津沽大學的耶穌會士最終亦不能全部幸免。1951年3月28日晚，卜相賢在耶穌會帳房-崇德堂被捕，暴安良在學校被捕，房如晦外出用餐返回學校時被捕。據貝興仁的「回憶性報告」記敘：第二天，大學行政樓和圍牆上貼滿反對天主教會和外籍傳教士的畫報。其中一幅漫畫是一位身穿黑色神職禮服的外籍傳教士騎在輪船的大炮之上。貝興仁詢問仍是大學校長的王俊德是否他還應該像往常一樣去上課。在得到了鼓勵的回答之後，貝興仁到達教室，但迎接他的是共產黨的歌曲，等學生們唱完之後，課程才開始。<sup>49</sup> 4月2日，津沽大學舉行「反帝愛國運動控

---

<sup>43</sup> *Histoire de 100 ans de la mission de Xianxian*, texte du Père René Petit, p.741.

<sup>44</sup> 《人民日報》，1951年4月6日，第1版，《津沽大學愛國學生向政府檢舉潛藏間諜》

<sup>45</sup> 譯自法語文件，法國耶穌會檔案，GMC 127/1.

<sup>46</sup> 法國耶穌會檔案，GMC 105/1. Lettre du Père Louis Watine à Madeleine, Tientsin, le 17 janvier 1951.

<sup>47</sup> 參照《河北大學史》，第21頁。

<sup>48</sup> 法國耶穌會檔案，GMC 105/1. Lettre du Père Louis Watine à Madeleine, Tientsin, le 17 janvier 1951.

<sup>49</sup> 法國耶穌會檔案，GMC 131/1. Rapport du Père René Petit, «Aux Supérieurs Majeurs de la Compagnie de Jésus».

訴大會」，約有 700 人參加。教師代表繆鐘彝、學生代表高樹楷等人控訴卜相賢等為國際間諜。4 月 6 日，《人民日報》發表宣告，稱上述三人為國際間諜，以宗教為掩護進行反革命活動、阻止信徒參加「三自革新運動」等。<sup>50</sup> 法國駐津領事在發給法國外交部的報告中這樣評論：三位耶穌會神父的被捕證明瞭共產黨領導的意願是要系統地將傳教士牽連到公共事務或者間諜活動之中，好尋找一個驅逐他們的理由，同時保留表面上對《共同綱領》所明文規定的信仰自由的維持。<sup>51</sup>

貝興仁神父是在津沽的講台上站到最後一班的外籍教師，他機械系主任的職務早已被取代，但他仍然負責各工作坊的運行，並給四年級的學生上課。4 月 30 日，他接到區警察局的傳喚，被告知：中國人民和人民的政府不再希望他繼續教書，他須限期離開中國。但機械系的新主任請求貝興仁再堅持授課兩周，因為教學助理還不能夠勝任。貝興仁提出了兩個條件：一是要付工資（為幫助他那不再有任何收入的同仁），二是學生們不得翻動其行李。（之前一位神父的行李被逐件檢查，學生們要用這種方式進行羞辱）。系主任向教務長彙報後答應了兩項條件。<sup>52</sup> 1951 年 7 月 11 日，津沽大學耶穌會院被沒收，最後兩位外籍神父鄂恩濤（Bornet）及 邵國華（Despeumaux）遷往崇德堂，不久後離境。

就在津沽大學被接收的同時期，天津市發起成立“天主教革新運動促進會”。1951 年 1 月 13 日發表反抗帝國主義分子、在天津建立“三自”教會的宣言。主要推動人有原《益世報》經理吳克齋、天主教法漢學校董事長張羽時<sup>53</sup>，簽署宣言的 16 人中有幾位是津沽大學和附屬中學的教師：范恩錕、李耀宗、吳健生，聶國藩、李鶴鼎。<sup>54</sup> 促進會」在天津大小教會學校組織宣傳「三自」，並要求信教學生在他們已經準備好的聲明上簽字。

津沽大學信教學生面臨著極大的信仰挑戰。一年多以來他們就承受著「打擊宗教的自由」所帶來的後果，受到共產黨學生的威脅：你們的信仰是反革命的觀點，如果不改宗、不更正觀念的話，你們在學校將不可能有好的成績，也因此不能夠得到文憑，不能夠在將

---

<sup>50</sup> 第 1 版文章：《接受津沽大學師生和愛國天主教徒要求，天津逮捕三個美國間諜，卜相賢等三犯以宗教為掩護一貫進行反動活動，津沽大學師生員工舉行控訴大會要求予以嚴懲》

<sup>51</sup> Robert Jobez, Consul de France, au Ministre des Affaires Etrangères. Hongkong, le 7 avril 1951. 法国耶稣会档案馆藏有复件，GMC 131/1.

<sup>52</sup> 法國耶穌會檔案，GMC 131/1. Rapport du Père René Petit, «Aux Supérieurs Majeurs de la Compagnie de Jésus».

<sup>53</sup> 天主教徒，1919 年就讀獻縣傳教區公學，1925 年進入小修院，期任公學聖母會的會長，1929 年考入天津工商大學，兩年後轉入北京中法大學，在那裡加入中國共產黨（1932 年 1 月）。畢業之後，張羽時在獻縣一帶秘密工作，1948 年受組織派遣，以天主教徒的名義到天津工商學院任教，天津解放後轉任聖母仲昆會開辦的法漢學校的董事長。（參考《河北大學史》，第 25 頁，底注 2。）

<sup>54</sup> 《人民日報》，1951 年 1 月 13 日，第 1 版。

來的社會生活找到工作和位置。是次，津沽大學的信教學生被要求表態支持「三自」。參加聖母軍的學生成為重點打擊對象，因為他們在校內很活躍，為聖堂禮儀提供服務、到醫院和家庭中看顧病患者，他們還有自己的聚會活動和場所。<sup>55</sup> 1951年7月13日，天津市長黃敬宣佈聖母軍是帝國主義分子控制的秘密組織，發起取締命令。14日，津沽大學組織了批判聖母軍的大會，學生會員們被一一登記。聖母軍華北分會長，津沽大學教師鄧華光被逮捕。15日《人民日報》指控聖母軍為反革命組織。<sup>56</sup> 21日的《人民日報》再發表文章：《聖母軍在天津的活動》，指控卜相賢利用津沽大學副校長和耶穌會會長的職務便利，領導津沽大學內的聖母軍，指派支會的指導司鐸和指揮團員蒐集情報、散播謠言、破壞天主教的革新愛國運動。<sup>57</sup> 天津「天主教革新運動促進會」於7月28日發表了《告全國教友書》，將聖母軍定性為「國際反蘇、反共、反人民的法西斯秘密組織，在列數其罪惡時提到：破壞天主教三自革新運動和支持其它反革命活動」。<sup>58</sup>

津沽大學的落幕與其天主教的身分是緊密連在一起的，中國天主教會亦從那個時期開始一段不確定的歷史。作為國有的津沽大學也僅僅持續了一年的時間。它在1952年全國院系調整的大潮中被拆分：工學院併入天津大學、商學院併入南開大學、文學院改建為師範學校，並逐步發展為河北大學，1970年遷往保定。原津沽大學的校園及建築今屬天津外國語大學使用。

---

<sup>55</sup> 參照法國耶穌會檔案，GMC 131/1. L'université catholique de Tianjin, note du Père Petit.

<sup>56</sup> 《人民日報》，1951年7月15日，《保護正當的信仰自由，取締反革命的「聖母軍」》。

<sup>57</sup> 《人民日報》，1951年7月21日，第3版。

<sup>58</sup> 《人民日報》，1951年8月4日，第1版。